

## 威妥玛《文件自述集》浅析<sup>\*</sup>

程 龙

**提 要** 《文件自述集》是 19 世纪中后期英国汉学家威妥玛针对在华外交官学习汉语书面语而编撰的著名国际汉语教材。美国加州大学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还保存着《文件自述集》及其注释,研究该书的编撰目的、版本、体例、内容及其影响将有助于探明西方人对晚清“文件体”书面语的认识与研究。

**关键词** 文件自述 威妥玛 语言自述集

著名汉学家威妥玛(1818—1895, Thomas Francis Wade)是晚清时期英国驻华外交官,曾任译员、副领事、海关总督察等职。1871 年,他晋升为英国驻大清帝国最高外交代表——“特命全权公使”。在长达四十余年的在华生涯中,他亲身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重要历史事件。例如,他曾以英国首席翻译之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参加了英法联军进占北京的军事行动以及与清政府的谈判。英国《泰晤士报》曾评价说,“威妥玛的一生正是中英四十年外交史的缩影,在所有对华决策过程中,他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sup>①</sup>

威妥玛之所以在外交领域地位显赫,主要得益于他超群的汉语水平。他平时除了进行外交活动外,也十分注意研究中国的语言,不但自身汉语水平达到了很高程度,还积极探索学习中文的方法,希图为外国人学汉语找到一条高效快捷的途径。《语言自述集》和《文件自述集》正是威妥玛为了实现上述目的而编撰的两部互有关联的汉语教材,这两部书凝结了他多年潜心研究汉语和汉语教学的心血。

近年来,学术界注意到《语言自述集》在国际汉语教育史中的意义和地位,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还出版了中译本,将《语言自述集》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但与此同时,学术界对《文件自述集》的研究则相对滞后,尚无专文介绍这部同样重要、同样能够展现晚清来华西方人如何学习汉语的经典著作。本文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所藏《文件自述集》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图书馆所藏《文件自述集·注释》为研究对象,力图对这一著作的体例、内容及其影响进行详细的梳理,并以《文件自述集》为切入点兼论西方人对晚清“文件体”书面语的认识与研究。

---

<sup>\*</sup> 本研究得到北京语言大学科研项目“十九世纪来华英人的汉语学习及其对近代英中关系的影响”资助。(项目批准号:07QN05)

① H. Cordier, Thomas Francis Wade, *T'oung Pao*, Vol. 6, No. 4, 1895.

## 一 《文件自述集》的编撰目的

为了说明《文件自述集》的编撰目的,不能不提到它与《语言自述集》的关系。《语言自述集》初版于1867年5月,半年以后,即1867年的12月,《文件自述集》面世。早在《语言自述集》第一版序言中,威妥玛就表示“这套教材主要分为两部分,分别被叫做《语言自述集》(Colloquial Series)和《文件自述集》(Documentary Series)”。<sup>①</sup>这说明,威妥玛把这两部书看作是同一套系列教材《自述集》中的两个组成部分。而事实上,他也几乎是同时构思和编撰这两部教材的。

威妥玛对于《自述集》系列教材的编写目的有很明确的说明:

我的责任之一,便是引导那些绅士们的学习活动,使他们得以在女王陛下的中国领事事务中谋得职位。传教士或者商人也可能会使用这套书,尽管他们会觉得这本刚刚面世的教材有些用处,但本系列教材的首要目的还是帮助那些从事领事工作的学生们在尽可能少的时间里得到该国官方口语以及书面语的基础训练,这种书面语出现在书籍、官方通信以及任何具有公文特点的文献中。<sup>②</sup>

威妥玛在《语言自述集》第一版序言中做出上述说明时,《文件自述集》还没有出版,但从他的论述可以看出,当时他已经对整套《自述集》教材有了明确的设计思路,即《语言自述集》讲解官方口语,而《文件自述集》则着重书面语的训练,但二者的教学对象是一致的,那就是在中国从事领事工作的外交官员,即威妥玛的后辈同事们。

在《文件自述集·注释》序言中,威妥玛也回应了他先前的陈述并具体指出了《文件自述集》的编写目的:

在六个月前出版《语言自述集》时,我曾经承诺将撰写题为《文件自述集》的中文教材。现在这本书便是《文件自述集·注释》的第一部分。与前一部教材(按指《语言自述集》)一样,《文件自述集》也是应在政府工作的学生们——而不是其他领域的读者——要求而编撰的。其特殊目的是为了帮助未来的领事翻译官们在尽可能少的时间里掌握官方书面语。<sup>③</sup>

在这里,威妥玛进一步明确了“翻译官”这一具体教学对象,而《文件自述集》的内容编排以及威妥玛所建议的学习方法也都紧紧围绕着“书面语翻译”这一具体环节来进行。可见,他编撰此书的主要意图在于提高外交官们的书面语翻译能力。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威妥玛在书中所介绍的“书面语”并不是普通的汉语书面语言,而是被西方人称为“文件体”的一种特殊书面用语。

## 二 西方人对晚清“文件体”书面语的认识与研究

随着对《语言自述集》研究的逐步深入,我们了解到,威妥玛选择的不是其他方言而

<sup>①</sup> Thomas Wade & W. Hillier, *Yu-Yen Tzu-Erh Chi: Colloquial Chinese*,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 1867. pp. xii.

<sup>②</sup> Thomas Wade & W. Hillier, *Yu-Yen Tzu-Erh Chi: Colloquial Chinese*,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 1867. pp. xii.

<sup>③</sup> Thomas Wade, *Key to the Documentary Series*, Vol. 1, Shanghai: Kelly & Welsh Limited, 1867/1905. Preface, pp. 2.

是北京话作为口语教学的内容,而这一选择是众多在华西方人长期实践总结和学术争论的结果。同样,《文件自述集》要选择什么样的书面语言作为外交官们的学习内容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的甄别过程。最终,以密迪乐(1815—1868, Thomas T. Meadows)为代表的西方人确定了一种叫做“文件体”的书面语作为外国人特别是外交官的学习对象。

1840年以后,西方人大量进入中国,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中国各地方言林立、差别极大,而书面语言则相对统一、各地通用。但绝大多数西方人忽视了汉语书面语在文体上的巨大差别,纷纷以儒家经典作为书面语的学习材料,但很快他们就在实际应用中遇到了难题。儒家经典著作与清末公文的行文风格大相径庭,其内容也与外交事务以及实际生活毫不相干。较早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对汉语书面语进行系统分类研究的是时任英国驻广州领事馆译员的密迪乐。

他首先注意到,“西方人学习汉语大多始于用古文撰写的《四书》。……而当他完成学习时,他连一份中文的官方书信或商业合同都无法正确翻译。反过来也是一样,在《四书》中学到的知识对于一个想把商业文件从英文翻译成中文的人来说同样毫无用处。”<sup>①</sup>在意识到文体差别之后,密迪乐开始了对汉语书面语的分类研究,他发现汉语书面语言看似相对统一,实则文体繁多,极为复杂。1847年,他在《漫谈中国政府与中国人》(*Desultory Notes on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China*)一书中将汉语书面语分为“古文”(Ancient Style)、“文章体”(Wan Ch' ang, or Literary Style)和“文件体”(Documentary Style, or Business Style)。儒家经典所使用的语言是“古文”;“文章体专门用于科举考试中”,<sup>②</sup>即八股文章。“文件体”则“被各种公私文件所广泛采用,如果我们除去小说、诗歌以及明显用古文风格所写的散文外,那么文件体就是当今的书面语,实际上是现代散文……毫无疑问,这种文体被上海或香港出版的中文报纸所采用,它的语言更像是官方文件而不是《四书》或者马端临所使用的语言,也不是历朝正史的那种风格”。<sup>③</sup>可见,西方人所称的“文件体”,就是晚清时期的书面语言,它有别于上古时期的古文,被广泛的用于19世纪的“书籍、官方通信以及任何具有公文特点的文献中”。<sup>④</sup>鉴于其实用性,密迪乐主张外交官们应该主要学习这种书面语。

为了使读者对西方人所谓的“文件体”书面语有所理解,我在这里引用一封西方外交官员用“文件体”书面语写给中国官员的信,这也是后来西方人用来作为“文件体”书面语学习的范文。信中,这位西方外交官主动提出用西医为中国官员患病的夫人医治。其全文如下:

昨日闻得令正夫人玉体违和,势甚沉重,不胜悬系之至,未悉是否愿服外国医药,如有欲延医用药之处,本大臣深可代为效劳。中怀挂念,希即玉复是望。此达,顺颂日祉,并候

① Thomas Meadows, *Desultory Notes on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China*, London: Wm H. Allen & Co, 1847. pp 13—23.

② Thomas Meadows, *Desultory Notes on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China*, London: Wm H. Allen & Co, 1847. pp15.

③ Friedrich Hirth, *Notes on the Chinese Documentary Style*, Shanghai: Kelly & Welsh Limited, 1888. Introduction, pp. 1.

④ Thomas Wade & W. Hillier, *Yu-Yen Tzu-Erh Chi: Colloquial Chinese*,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 1867. pp. xii.

令正夫人金安。<sup>①</sup>

密迪乐在汉语研究方面的很多开创性工作都对威妥玛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早在威妥玛着手建立北京话注音体系时,他就借鉴了密迪乐的成果。在书面语分类和教学方面,威妥玛更是全盘接受了密迪乐关于“文件体”的论断,并将自己编撰的教材冠以“文件”二字。关于密迪乐的启发和影响,威妥玛也毫不讳言:

我要感谢密迪乐,不仅因为他给我指明了开始的方向,而且在于他给我的帮助是当时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提供的。他稍后出版了《漫谈中国政府与人民》一书,我要感谢书中关于中国语言和行政管理的篇章。……正是由于密迪乐的建议,我才走上正确的轨道。<sup>②</sup>

密迪乐指出“文件体”书面语是外交官学习的首要选择之后,大多数西方人均持赞成态度,相关教学活动也随之开展,但由于缺乏专门教材,“文件体”书面语的教学活动一直进展缓慢。整整二十年之后,作为外交官的威妥玛身感实际需要的迫切,遂第一次以系统专著的形式尝试实践“文件体”书面语的教学。

### 三 《文件自迩集》的版本、体例和内容

1867年出版的《文件自迩集》由两本书组成,一本叫做 *Wen-Chien Tzu-Erh Chi: A Series of Papers Selected as Specimens of Documentary Chinese—Designed to Assist Students of the Language Written by the Officials of China*,即《文件自迩集:文件体范文选——为帮助学习中国官方书面语的学生而设计》,在这本书封面的最上方有“文件自迩集”五个汉字,为横版自右至左;另一本叫做 *Key to Tzu-Erh Chi: Documentary Series, Vol. 1*,即《自迩集注释:文件系列》第一卷,书的封面上没有汉字。为了论述的方便和简略,我把前一本书称作“《文件自迩集·正文》”,把后一本书称作“《文件自迩集·注释》”。

在《文件自迩集·正文》中,威妥玛精心选取了148篇“文件体”范文,并将它们分为16卷。关于该书收录的文章篇数,顾亮提出是150篇,<sup>③</sup>但我所见到的版本收录148篇,而威妥玛本人在《文件自迩集·注释》序言中也明确提到“本书包含了148篇范文,从目录可以看出,这些文章依据它们的属性和来源被分成了16卷。”<sup>④</sup>这148篇文章在书中连续编号不以卷次为限,从第1件到第148件。张卫东曾在韩国奎章阁发现此书的抄本,“始第一卷,终第十六卷,中无第七、八、十一、十二、十三卷,但文件号未中断,仅自109至120百位之后缺编号;实有11卷120个文件”<sup>⑤</sup>。此抄本以第九卷接第六卷,但文件号却仍然衔接,这实际上已经打乱了原书的编排顺序,显然系抄写者有意所为,而他之所以完整的保留前六卷,而略去第七卷以后的若干卷次,似乎也有他的道理。这可能与《文件自迩集·注释》有一定关系,关于这一点,我在后面的论述中还会说明。

① Thomas F. Wade, *Wen-Chien Tzu-Erh Chi: A Series of Papers Selected as Specimens of Documentary Chinese*, London: Trubner & Co., 1867. pp 64.

② Thomas Wade & W. Hillier, *Yu-Yen Tzu-Erh Chi: Colloquial Chinese*,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 1867. pp. xvi.

③ 顾亮《威妥玛与〈语言自迩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第16页。

④ Thomas F. Wade, *Wen-Chien Tzu-Erh Chi: A Series of Papers Selected as Specimens of Documentary Chinese*, London: Trubner & Co., 1867. pp 1.

⑤ 张卫东《〈语言自迩集〉译序》,《汉字文化》2002年第2期。

《文件自迓集·正文》的十六卷分别是第一卷“平行公文”,第二卷“往来信函”,第三卷“小民稟稿”,第四卷“欸贴法程”,第五卷“移详公牒”,第六卷“陈公檄文”,第七卷“韩公奏疏”,第八卷“林公奏疏”,第九卷“蓝玉霖书”,第十卷“钱恬斋尺牒”,第十一卷“李牧堂书”,第十二卷“陶公尺牒”,第十三卷“吴公尺牒”,第十四卷“杂文”,第十五“卷贸易规则”和第十六卷“续录”。

威妥玛认为,前四卷是全书最为重要的部分。“前四卷的课程内容是一个在领事职位上工作的翻译员最先就要处理的问题”,而在此基础上,“为了及时了解他所任职的口岸及其邻近地区发生的事务……为了了解中国政府的信息和帝国的现状,他还应研究中央或地方政府就某些问题给皇帝陛下的奏折以及皇帝对这些奏折的答复或直接发布的旨意”,为了向领事译员们提供上述信息,“本书的后十二卷,除了第15卷是关于商贸方面以外,全部是向翻译官们介绍上述内容”。<sup>①</sup>

威妥玛之所以把前四卷内容列为“翻译员最先要处理的问题”,主要原因是这几种文书都有可能在清廷官员与驻华外交人员之间往来,外交官们不但要能读懂和翻译,而且还要有能力进行回复。在第一卷“平行公文”的二十篇范文中,威妥玛选择了1842年至1847年间两广总督督英分别给英国商务总监璞鼎查和香港总督德庇时的电文共八封,主要目的就是让翻译官们学会处理清政府专门发给外国人的交涉电文;第二卷“往来信函”的十篇文章隐去了收信人和发信人,信中内容多与涉外事务有关,但不及“平行公文”那么正式,多系中外官员之间的私人通信。如第26号文件,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外交官致信中国官员,主动提出用西医为他患病的夫人医治;第三卷“小民稟稿”则收录1845年到1849年间香港地区普通民众向总督府递交的行政文书八篇,阅读和处理这些文书这对于英国官员有效管理香港民政尤为重要;第四卷“欸贴法程”收录了各种法律文书,如诉状、传票、甘结、房契、地契等等,这对于英国外交人员在开放口岸行使领事审判权以及维护本国经济利益都是不可或缺的。正是因为以上四个部分涉及领事外交官最基本的业务范围,威妥玛才认为这些是最重要和最核心的书面语知识。

从第5卷到第16卷,威妥玛选取了一些清朝官员们的奏议、尺牒、檄文等官方文书,让外交官们进一步了解“文件体”书面语的使用范围和特点。由于这些文件不可能直接发给外交人员,更不需要他们的参与或回复,因此,他们只要读懂意思,作为决策时的参考就可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文件不如前四卷的内容重要。尽管如此,威妥玛还是尽可能多的选取有代表性的文件,内容囊括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文章作者也包含了一些当时声名显赫的官宦。如第五卷“移详公牒”收录了1852年太平天国起义军经过湖南时,宝庆知府魁联的几封军事文件;第十卷“钱恬斋尺牒”则多涉及财政方面;第八卷“林公奏疏”和第十二卷“陶公尺牒”则分别选取了清朝名臣林则徐和陶澍的文章。可见,威妥玛在内容的选取和编排上是极为用心的,他对于自己的编撰工作也十分满意,“这个文件集很好的达到了最初预想的目的,让学生们直接接触到大量经过合理删节的中文官方文献”。<sup>②</sup>

① Thomas F. Wade, *Wen-Chien Tzu-Erh Chi: A Series of Papers Selected as Specimens of Documentary Chinese*, London: Trubner & Co., 1867. pp 1.

② Thomas Wade & W. Hillier, *Yu-Yen Tzu-Erh Chi: Colloquial Chinese*,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 1867. pp. xii.

《文件自述集·正文》收录的148件“文件体”书面语范文均系中文原文,竖版印刷,页十二行,行十九字,这对于初学的外国人来说阅读起来有一定困难。为此,威妥玛又特别编撰了《文件自述集·注释》为这些范文提供必要的英文说明和翻译。

《注释》和附录会为研读本书的读者们提供大量而详细的解释,并为他们指明继续深入研究的方向。现在,伴随这一课程的《注释》正在筹备中,后面可能还会附上全文翻译。<sup>①</sup>

威妥玛原本的设想是为所有148篇文章提供注释和译文,不过,1867年出版的《文件自述集·注释》只有第一卷,正像该书封面上所标注的那样,仅仅包含了“第1件到第75件文件的译文”和“第1件到第65件文件的注释”。不过,由于最为重要的前四卷内容已经包括在内,威妥玛认为现有的这些注释对于学生们的需求也足以应付一阵:

现在出版的《注释》第一部分仅仅包含了一半中文文章的翻译和三分之一文章的注释。注释中需要参考的附录不可避免的被推迟出版了。但在接下来的部分出版之前,目前的这些内容已经足够初学者们学习的了。<sup>②</sup>

关于《文件自述集·注释》的下半部分,顾亮根据“教材内页标题下注有‘Volume 1’字样,加之在《文件自述集》英语译本自序中的自述”,推测“应有两册分开出版。因此不排除尚有一册译本的可能,但具体出版情况不详”。<sup>③</sup>那么,威妥玛是否编撰出版了《文件自述集·注释》的后半部分呢?据法国著名汉学家考狄(Henry Cordier, 1849—1952)研究,威妥玛并未能实现他的承诺,1895年威妥玛逝世后,考狄在法国汉学杂志《通报》上发表纪念文章,高度赞扬威妥玛的汉学成就,并在文后附上威妥玛所有著述的目录,其中《文件自述集·注释》一项下仅有第一卷。<sup>④</sup>可能是繁重的外交工作分散了威妥玛的精力,也可能是实际教学效果令他相信这些内容已经足够了,威妥玛没能继续完成后面的注释工作。

《语言自述集·注释》所包含的第1至第75件文件译文涵盖了第一卷至第七卷的所有篇章,而第1至第65件文件的注释则包括了第一卷至第六卷的文章。由于第七卷以后的文章缺乏译文和注释,绝大多数外国人无法自学,因此《文件自述集·正文》第七卷以后的内容利用率极低。此书再版时,出版商索性省去了第七卷以后的内容,这就是有些学者见到的版本只有七卷75篇文章的缘故。现在我们似乎可以理解韩国奎章阁抄本自第六卷以后出现缺省的原因大概也是因为自此以后没有注释,不便学习,抄写者便有意进行了省略。

《文件自述集》出版后,以其选材丰富、内容广泛以及针对性强、实用性突出的特点立刻畅销起来,发行量极大,以至于“每一位学习文件体的学生手里都有这本书”,该书出版二十年后,“市场上还有相当数量在流通”。<sup>⑤</sup>

需要指出的是,威妥玛虽然在《文件自述集》中提供了大量“文件体”书面语的范文和

① Thomas F. Wade, *Wen-Chien Tzu-Erh Chi: A Series of Papers Selected as Specimens of Documentary Chinese*, London: Trubner & Co., 1867. pp 1.

② Thomas F. Wade, *Wen-Chien Tzu-Erh Chi: A Series of Papers Selected as Specimens of Documentary Chinese*, London: Trubner & Co., 1867. pp 1.

③ 顾亮《威妥玛与〈语言自述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第16页。

④ H. Cordier, Thomas Francis Wade, *T'oung Pao*, Vol. 6, No. 4, 1895. pp 412.

⑤ Friedrich Hirth, *Notes on the Chinese Documentary Style*, Shanghai: Kelly & Welsh Limited, 1888. Introduction, pp. 1.

部分翻译,却并没有对“文件体”书面语的独特语法特点和用词习惯给予说明和解释,这给广大初学汉语的西方外交官带来了一些的困难。这一工作直到19世纪80年代末,才由驻华外交官、德国汉学家夏德完成。

#### 四 《文件自迓集》的意义和影响

《文件自迓集》肯定和推动了密迪乐等西方学者的“汉语书面语分类研究”。西方人对晚清“文件体”书面语的认识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密迪乐开始,经过二十年的反思与争论,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期,西方汉学界基本认定和接受了密迪乐的分类研究。《文件自迓集》乃是对这一研究结论的肯定性应用,以大量范文实例为密迪乐的结论做了最为生动详尽的注脚,进一步凸显了“文件体”书面语的实用价值,有效推动了“文件体”书面语的教学,为后来“文件体”的研究与教材编写奠定了基础。

《文件自迓集》出版二十年后,德国汉学家夏德(Friedrich Hirth, 1845—1927)在此基础上将“文件体”书面语的教学与研究推向了高潮。他接连编写了《文件字句入门》、《新关文件录》、《文件小字典》等一系列“文件体”书面语教材。不过,夏德始终以威妥玛《文件自迓集》所提供的范文为最基本的教学内容,并且始终没有偏离《文件自迓集》的教学方向和教学目标。他多次强调,其著作里“所采用的例子大多选自威妥玛的《文件自迓集》,只有几个例外”,而要掌握好“文件体”书面语“应该像威妥玛《文件自迓集》所要求的那样去学习”。时间的考验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文件自迓集》的经典,直到1905年,即《文件自迓集》初版近40年后,这部教材仍在上海、香港、横滨和新加坡同时再版发行。

《语言自迓集》和《文件自迓集》对口语教学和书面语教学的明确区分以及根据教学对象精准选择教材语料,是威妥玛对汉语教学的重要贡献,自此开创了全新的汉语教学模式,也对当时整个西方以及韩、日汉语教学、教材编写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由于这两部教材在教学材料的选择上都做到了选文的经典性、实用性、趣味性兼顾,这也对后续教材的选文原则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再次,从整个汉语教学史,或者西方人汉语学习史的角度看,威妥玛的著作起到了转折作用,从此,西方人的汉语学习开始转向主要以实用、而非研究为主要目的。

《文件自迓集》是近代西方人编撰的第一部以晚清“文件体”书面语为教学内容的优秀国际汉语教材。它解决了以儒家经典作为汉语学习材料所导致的“学用脱节”问题,使西方人特别是外交人员能够在短时间内提高汉语书面语水平,从而尽快适应领事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其对于外国商人和传教士的书面语学习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书中的范文多直接选取晚清时期中外之间的交涉电文、往来信件等,无形中保存了大量珍稀历史文献,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和国际汉语教育史都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作者通讯地址:程 龙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 100083)

(责任编辑 晓 文)